

“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①。而毫无疑问庆祝仪式类似于其他仪式,它通过诸多的象征符号以编码或解码的形式形塑和操控了参与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性观念;更高明的在于“引导着对这些观念解释”的同时,它使得参与者“相信所见到的秩序并非出自我们自身(文化之手),而是为这个永恒的世界自身所有”^②。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运用的一些文本载体及其文字符号来看,其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发挥着以下的功能价值。

对政党指导思想的诠释和发展。“诠释”体现在对为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上。如在1941年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而撰写的文章中,朱德认为“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③。1943年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而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王稼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评价为“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④;另外,此文还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停留在主观的空想的与公式的基础上”,而应该“放在唯物的现实的与科学的基础上”^⑤。同样是1943年,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中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列宁那样不只表面上、口头上承认、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更在于“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⑥。可见,通过“诠释”的目的,就是使庆祝仪式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明白要科学地认识和有效地改造

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思想前提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做一个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质、形成特点和指导作用的阐释和分析上。这些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能够获得有力的佐证。如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理论性质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⑦,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⑧;具体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特点,指出毛泽东思想除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的产物,其也是在各种斗争中即“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成熟起来的^⑨;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在于“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⑩。另外,其他的一些庆祝仪式文本也给予了上述相关类似的阐释和分析。如《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刘少奇强调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⑪,要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就“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⑫;1949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董必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指出“我们最大的光荣就在于我们有了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我们奋斗的方向和道路”^⑬。通过“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庆祝仪式

①(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②(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⑪《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⑫《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⑬《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清楚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价值的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面对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生态环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政党奋斗目标的诠释和发展。这里的“诠释”主要指借助于庆祝仪式的具体对象来对党的奋斗目标进行较为周详的理解和解释。如在庆祝苏俄十月革命的仪式中,通过具体阐释苏俄苏维埃政权性质及其各方面特点,从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或“苏维埃中国”这一奋斗目标能有较完整理性的认识。以1926年所发布的《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为例,其将苏联苏维埃共和国描绘成政治上“俄国共产党始终密切接近于工农群众,坚定领导他们奋斗以反对压迫者”^①,经济上“先满足工农群众的要求,农民几百年来奋斗以争地主的土地,革命成功马上就分地主的土地给他们”^②、“直接管理底下已经有一切的工业以及农村经济”^③,民族关系上变成了“自由民族真正自由的联合”^④。同样,通过庆祝和纪念“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也在于让民众认识到反对剥削、压迫和实现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包括妇女)的解放属于中国共产党所设计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如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⑤。1932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议》中,强调“苏区的劳动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劳动法女工全部的利益,得到了一切自由和解放”^⑥。而对政党奋斗目标的“发展”,则体现在根据具体政治生态环境实践变革的需要,

及时地调适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并给予宣传,分析了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和党的最高奋斗目标以及与辛亥革命目标的关系等方面。如对于第一个方面,国民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的前中期更多地倡导建立如苏俄那样的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中国,“只有苏维埃中国才是中国民众之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唯一保证”^⑦;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1940之前)更多地宣传那种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基础上的、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⑧即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自己的诺言,实行三民主义,取消暴动政策,苏维埃制度改为现行民主制度”^⑨“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一定要使之彻底实现于全中国”^⑩;抗日战争中后期(1940-1945)更多地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内战爆发后更多地主张“推翻蒋介石的卖国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⑪。对于第二个方面,从当时一些庆祝仪式的文本可以发现党已经认识到了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对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发挥了方向指引的作用,而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又是逐渐达到党的最高奋斗目标的具体步骤和重要手段。如1938年《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⑫，“由于国内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而在其基本奋斗目标方向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⑬。同样,也强调了党的基本奋斗目标才是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如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明确“今年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于指示民众:……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403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⑧宋俭:《毛泽东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①。192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②。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党借助于庆祝仪式对政党奋斗目标进行诠释和发展,有效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将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制度安排”^③,也使得党的政治奋斗目标在仪式的渲染中而日益具有浓厚的合法化色彩。

(二)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庆祝仪式承载着论证和动员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党行为方式,指的是政党在实践生活中所运用的特定的行为方法和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行为样式。从政党文化视域来看,它属于行为文化层级。而庆祝仪式之所以能够和政党的行为文化发生联系,既在于仪式的本质就是“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行为模式”^④,也在于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仪式的主办者“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⑤。通过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使用的文本,就会发现一方面党借助于庆祝仪式将自身的政党行为与庆祝对象关联起来,特别是把庆祝对象的行为纳入到政党行为的历史和现实逻辑中,从而充分论证和呈现政党行为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庆祝仪式在情感上的激励、动员功能,让仪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⑥,从而推动政治生态环境变革实践的持久化和深入化。

对政党行为正当合理性的论证和阐释。这个方面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在于通过对一些庆祝对象行为的历史价值或者失败原因的阐释,间接论证中共的政党行为与之的关系,即中共的政党

行为就是对那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庆祝对象行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就是对那些虽有历史价值但最终失败的庆祝对象行为的纠正并将其中正面的行为给予继续。如以庆祝和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和“双十”节的仪式为例,就会发现两者间接论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主要肯定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1926年中共在《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中,认为苏俄十月革命不仅帮助俄国工农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对于我国来说“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以求民族解放及民众革命政权之斗争中的第一个兄弟和同盟者”^⑦;为此,提出了师学十月革命,“利用之于求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⑧。193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发布的《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高度评价苏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⑨,同时指出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中国的革命必须集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⑩。而庆祝“双十”节的仪式中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则更多地揭示其失败的原因和局限性。如192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中,强调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致使辛亥革命受挫,以及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往后的辛亥革命多加一个根本任务——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⑪;在此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是辛亥革命唯一的完成者与领导者”^⑫。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中,肯定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强调由于当时革命阵营中藏有妥协分子而使其实际上归于失败,正是鉴于此,“中国人民沿着辛亥革命的道路,为民族民主革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③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④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⑤(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页。

⑫《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

三十年如一日。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①。二在于直接宣示中共的政党行为与一些庆祝对象行为的关系,公开传递出中共的政党行为就是对其的传承与发展这样的讯息。如1930年为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中,毫不隐讳地强调广州暴动就是“中国工农群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树立起苏维埃的旗帜”;1934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今年乃至今后的庆祝“三八”妇女节的运动及其妇女工作中必须向中国的广大妇女“解释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②;1937年《中央关于五一节的决定》中,就指出国际“五一”是“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日子,是检阅自己力量的日子”,相应地我们的“五一”节应成为“中国人民团结的日子,成为检阅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力量的日子”^③。

对参与政党政治行为的激励和动员。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并不只在于为庆祝而庆祝,它有着深层次的用意,即在于通过激励和动员直接或间接的仪式参与者来付诸于行为实践,最终接近或达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政治仪式的主脉^④。这点上,当时的作为仪式的主办者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如1926年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明确指出“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意义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应利用这个纪念日,作以下几种重要的宣传工作”^⑤;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提出“趁‘五一’节的机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⑥,在《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强调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决不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

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⑦;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直接宣示“今年的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于指示民众: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⑧;1933年《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中,号召民众要用“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⑨。在如何激励和动员方面,除了前面相关的论述(即庆祝仪式在主旨上所呈现出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以及借助于庆祝仪式实现政党奋斗目标的诠释和发展)所体现出的指明具体行动方向以告诉民众做什么之外,还表现在注重从展示行为成就为民众的行动提供榜样和激励、阐释行动方略以告诉民众怎么做这两个维度上。前者,同样如《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指出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近两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其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⑩;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强调相对于十六年以前“差不多是全中国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而现在“在一年之中,工农群众奋起斗争,引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⑪;193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强调“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和红军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四川和满洲这些辽远的地域上飘扬着,苏维埃政权大大的巩固了”^⑫;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更是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正确性,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拥护。后者,立足于具体历史时期变革政治生态环境任务的需要,同时针对不同的革命民众和斗争领域,提出了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637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④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3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一些详实的行动方略。如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就号召广大工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求改良生活，增加工资，要求失业救济，要求工作”；劳动农人们要团结起来“为土地而斗争”；白军士兵们“应当倒转枪头去打国民党军阀，和红军一块儿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革命学生和城市平民们应该“和工农群众一块儿去斗争”^①。1941年在所发布的《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关心妇女生活痛苦”等八项工作视为经常性的工作^②。另外，还主张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其他政党政治行为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如1926年为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有真正的革命群众”“有真正能领导群众坚强的政党——共产党”“革命是真正站在群众的观点上”，并强调这些成功的根本原因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才能促进革命“有真正胜利的可能”^③。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1943年），《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其中明确指出“辛亥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④。

（三）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党心理取向，指的是经过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化后，组织及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心理意识。而在政党心理取向中，“记忆”和“意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记忆”是将政党心理取向的过去和现在乃至未来实施联结的重要方式，是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能否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以形成良好习惯和健全人格特征的前提条件。“记忆是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时间上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是经验积累和心理发展的前提。”^⑤

而“意志”，作为一种心理状况和过程，则对政党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特别是面对困难时的行为具有发动、坚持和调适、改变等方面的功能价值。“意志是意识的组成部分，但意志不等同于意识，感觉（以及认识）是外部刺激向内部意识事实的转化，意志则是内部意识事实向外部动作的转化。……人的意识对行动的调节是通过意志实现的。”^⑥庆祝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与其他仪式一样其存在除了社会基础之外也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基础”，“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⑦。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运用的一些文本载体及其文字符号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

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建构的功能价值。仪式既将“记忆”视为自身的内在特征之一，也为社会如何记忆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⑧。前者在于仪式必须要储存社会记忆从而“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⑨；后者在于仪式具有“重演先前原型行为之行为的倾向”^⑩以及“有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⑪。民主革命时期党举办的庆祝仪式发挥着记忆建构的功能，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记忆的唤起和展示。如对某些历史性实践诸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五一国际工人运动等进行了周期性的庆祝纪念，此本身就蕴含着希冀通过定期、重复式的庆祝操演使这些历史实践活动“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模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⑫这一意愿。同样，从文本载体来看，在对上述历史实践活动进行庆祝纪念时，往往用了较大篇幅给予介绍和阐释。如以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为例，1926年《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0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⑤杨治良等：《记忆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⑥张西方：《意志心理概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⑦（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⑧曲比阿果：《仪式的群体表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6期。

⑨（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⑩（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⑪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

⑫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

作》及其附件《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就对苏俄十月革命的成果、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以及苏维埃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抵抗一切的敌人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93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也对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意义、苏维埃政权如何巩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行了追溯与回顾。而考察党成立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为救国救民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历史,更是党庆仪式中的传统惯例。如1943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王稼祥就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如何为“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①的历史,以及在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进行探索的实践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二是对记忆的重塑和完善。这点在对涉及历史记忆的有关政治符号(诸如“五四”符号、“十月革命”符号、“孙中山”符号、“三民主义”符号等)实行富有新意的时代诠释上最为典型。以“五四”符号为例,不同于国民党将“五四”节视为一个艺术节,企图通过这个节日“为青年指出一条走向‘国民革命’的成长道路”或强调“青年一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②;而中共则将其视为一个“青年节”给予庆祝纪念,并且把“五四”符号解读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以及反抗强权的革命运动。如1939年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青年节及“五四”运动:“‘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③。以“十月革命”符号为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更多将其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分别突出了其“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斗

争”的意蕴。同样以“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符号为例,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都立足于具体实际对它们的内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造。如前者中共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段将其视为“反帝反军阀的标帜”,抗日战争时期将其视为“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党派合作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则将其看作“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标志特别是作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的象征来对待^④;而后者,20世纪40年代之前认为坚持“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精义,40年代之后明确坚持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见,对有关历史记忆政治符号的重塑和完善,既在于赋予这些历史记忆现实的意义,从而“使政治传统或政治历史在变迁中维持和发展”^⑤;也在于为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更富有历史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辩护。

庆祝仪式彰显着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意志力是衡量和判断政治主体的行为有无意志或意志强弱的主要尺度。而意志力内部是由“政治决心”“政治恒心”和“政治信心”等要素所构成的,其中“决心是目标、是前提,恒心是客观条件、是关键,而信心是精神状态、是重要条件”^⑥。尽管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并不是专门讨论政党行动意志的,但是在对庆祝相关的实践评价时所论及的成功性、艰辛性和精神力量性时,又与政治意志力的内在结构中的“决心”“恒心”和“信心”等发生关联,而这些充分体现了庆祝仪式的意志建构价值。具体为:一是强调实践变革的成功需要正确目标的导引,从而要求人们坚定参与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相关实践的意志“决心”。如1927年为庆祝“双十”节而发布的《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将辛亥革命后的十六年和近一年来中国实际状况进行对比,号召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⑦。同样,1932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议》中,也通过苏区和国统区妇女状况的鲜明对比,动员广大妇女“在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②张艳:《“青年节”抑或“艺术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④王楠:《论民国时期中共对孙中山符号的界定与阐释》,《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5期。

⑤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4页。

⑥姚选民:《论政治意志力的内在结构——以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为背景》,《云梦学刊》2017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党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抗死亡饥饿,拥护苏维埃政权英勇地斗争”^①。二是突出实践成就的取得是长期奋斗的结果,从而告诫人们保持参与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相关实践的意志“恒心”。1943年为庆祝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撰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刘少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来的历史以及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的历程,指出“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它经过了多次的胜利,也经过了多次的挫败,它走着非常迂回曲折的道路,以至于今日”^②。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各地的不断解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多次强调这些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尚望前后方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③。三是弘扬成功实践中所体现的奋斗精神,从而增强人们树立参与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相关实践的意志“信心”。如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为“五一”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赞扬了中国工人阶级身上所体现出的“勇猛牺牲的精神”,强调这种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的”^④。同样是《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刘少奇就指出“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⑤。1947年1月1日在新年祝词中,毛泽东强调只要全国人民坚持和弘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⑥。

(四)从政治社会化来看,庆祝仪式担负着沟通和认同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指“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⑦。可见,政党文化中无

论是观念文化,还是行为文化乃至心理文化,要被党内外民众真正接受和认可,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离不开政治社会化这一关键性的传导路径。而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不仅推动着政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同样自身还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发挥着“传播教育”的功能^⑧;特别是通过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性、实行沟通话语的“接地气”,以促进和增强政党文化的认同性。

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化,以促进政党文化的认同性。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沟通是“桥梁”和“整合剂”。有效的沟通,才能获得稳定、持久性的认同。民主革命时期所举办的各种庆祝仪式中,党就十分重视政党文化在政党内民众及其组织中的传递和交换。在1931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明确“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⑨。而这种政治社会化中一个重要的实践特征就是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化,如表现在沟通情境的多样化、沟通模式的多样化和沟通载体的多样化等方面。沟通情境的多样化,从庆祝仪式的文本看,就是有意识地运用生动的语言以描绘或创设多种具体的情境,如在庆祝十月革命仪式中设置了苏俄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处于压迫剥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境;同样在诸如庆祝纪念“双十节”或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仪式中,也创设了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时的过去中国历史的情境,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时的中国现在的情境。构建这些多样的情境,目的在于让仪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获得一种形象的场景体验,感受到中共政党文化的科学真理性和其指导下的实践的现实正当性,从而改变心灵深处原有的与中共政党文化不一致的认知结构,或者提升、巩固原有的与中共政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⑦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⑧王淑琴:《政治仪式推动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兼论政治仪式的特性》,《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9期。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党文化相一致的认知结构,归根结底实现对中共政党文化的内化和深化。沟通模式的多样化,从庆祝仪式的主办和推动力量来看有政党主导的沟通模式、政府主导的沟通模式、社会组织主导的沟通模式以及大众传媒主导的沟通模式等。这些说明当时中共政党文化的政治社会化“不是一个静止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多重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①。沟通载体的多样化,仅仅从庆祝仪式所运用的文本载体来看就有通告、决议、决定、宣言、会议演讲、报告、社论、祝词、标语口号、庆祝纪念文章等。这些沟通载体针对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对象,也发挥了具体性的作用。如“通告”在一定范围内向民众公布了庆祝仪式活动应当遵守或者周知事项;“决议”“决定”更多地强调庆祝纪念活动必须遵守或周知的事项,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大会演讲、报告等则“提纲挈要,表明纪念活动的基本态度和重要价值,呈现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战略设想,部署大政方针”;社论“用准确、客观、理性的语言进行系统分析,充分展示历史、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标语口号“文字简短有力、朗朗上口,内容高度浓缩,公众喜于观看、易于识记、乐于接受,效果激情震撼”;纪念性文章则是“摆事实、讲道理,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②。

实行沟通话语的“接地气”,以增强政党文化的认同性。“话语的功能在于确定公众可以使用的专业知识与日常知识的形态,它是社会的规范性框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③因此,政党文化能否被有效地认同,话语及其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④。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会发现党非常注重沟通话语的建构,尤其是突出沟通话语的“接地气”,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接受话语所描绘的“思想体系”^⑤。例如,一是沟通话语的内容“接地气”,表现为密切联系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如在“五一”庆祝纪念活动中,提出“特别要宣传劳动法,……特别要针对

各地工人群众的痛苦,说明这一法令的实际意义,鼓动工人群众为实现这一法令而斗争”^⑥。同样,在“三八”节的庆祝纪念活动中,强调“党的妇女部及工会的女工部要根据各地的女工农妇的实际要求,提出具体的要求纲领,深入到群众中”^⑦。一定程度上说,内容上的“接地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多种角色,使其更有“亲和力”。在庆祝纪念“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争取人民权利、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武器;庆祝苏俄“十月革命”等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的科学指南;庆祝“双十”节等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的角色。同样,民主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段所举办的庆祝仪式活动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的身份;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多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的身份。二是沟通话语的方式“接地气”,表现为突出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的相融相联性。如在庆祝纪念“五一”时,强调宣传务必要“经过公开的群众路线推广发行”,指出“在各厂各校尤其要建立群众自己的宣传品,如工厂小报与传单标语壁报,引导群众自己著,自己写,自己散发”^⑧。在庆祝和开展“红五月”的运动中,一方面要求“在地方党报及党所领导或影响的一切刊物杂志画报上,必须出版苏维埃专号”,另一方面强调“除转载大会宣言决议案外,并须多作通俗浅近的文章或图画,以及各种小册子,使这一宣传极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⑨。在庆祝纪念“三八”节时,要求“将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与白区苏区劳动妇女的生活,印刷各种简单清楚的宣言,传单,歌谣,画报,小册子等刊物,向劳动妇女群众作广泛宣传”^⑩。三是沟通话语的思维“接地气”,表现为大量运用符合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的“相似性思维”,即“不要求助于分析、分解而去将事

① 阎宏斌:《试析政治社会化功能与运作模式——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政治教育》,《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 邓阳艳,童小彪:《党报党刊的纪念话语方式探析——以〈人民日报〉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③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话语分析:知识结构与论证方式》,包汉毅译,《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④ 柴亚林:《生成与互交: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关系研究——以回族的抗战记忆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5期。

⑤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话语分析:知识结构与论证方式》,包汉毅译,《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物打成碎片,而是直接地在完整的事物间去发现联系和建立起联系”^①。这种“相似性思维”,相对于工业社会占主导的“分析性思维”在于“要求弄清楚事物是什么”而言,其“所关注的则是事物的意义是怎样的”^②，“借助于相似性思维及其想象”来“获得开展行动的依据”^③。从民主革命时期党举办的庆祝仪式所运用的文本来看,“相似性思维”极其常见,如庆祝纪念十月革命时将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苏联

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中国革命胜利后未来社会的状况、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等联系起来;庆祝纪念辛亥革命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联系起来;庆祝纪念“三八”和“五一”等节日时将世界劳动人民争取权益的实践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等联系起来。总之,通过这些联系,促进人们对中共政党文化的理解,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划自己的实际行动。

On Application Features and Functional Value of Celebration Ceremon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Party Culture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ZHU Qing-yu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celebration ceremonies held by the Party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Party culture were an interactive unity. Taking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as an observation point, we can fi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is placed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party culture, and various resource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special space-time backgroun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 or even shape the various features of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in its application, such as insisting on periodic and non-periodic cooperation in celebration types, insisting on the unity of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in celebration methods, insist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celebration theme, and insisting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motion in celebration t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has a complex stress response to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Party culture. For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ideology,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plays a functional value of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behavior,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bears a functional value of demonstration and mob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shows a functional value of memory and will construc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culture socialization,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bears a functional value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celebration ceremony; The CPC; Party culture; features; functio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